

CORPORATE RESPONSIBILITIES IN TURBULENT TIMES



动荡时代的 企业责任

CHALLENGES FOR THE 21ST CENTURY

21世纪面临的挑战

罗布·范图尔德 (Rob van Tulder) ©著
刘雪涛 曹蓁蓁 姜 静©译



中国经济出版社
CHINA ECONOMIC PUBLISHING HOUSE

CORPORATE RESPONSIBILITIES IN TURBULENT TIMES



动荡时代的 企业责任

CHALLENGES FOR THE 21ST CENTURY

21世纪面临的挑战

罗布·范图尔德 (Rob van Tulder) ©著

刘雪涛 曹蓁蓁 姜静 ©译



中国经济出版社
CHINA ECONOMIC PUBLISHING HOUSE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动荡时代的企业责任: 21 世纪面临的挑战/(荷)范图尔德著; 刘雪涛, 曹蓁蓁, 姜静译

北京: 中国经济出版社, 2010. 3

ISBN 978 - 7 - 5017 - 9656 - 4

I. 动… II. ①范… ②刘…等 III. 企业—社会功能—研究 IV. F27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212258 号

Corporate Responsibilities in Turbulent Times: Challenges for the 21st Century

by Rob van Tulder

Copyright © 2010 by Rob van Tulder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0 by China Economy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策划编辑 姜 静

责任编辑 伏建全 姜 静

责任印制 张江虹

封面设计 华子图文设计公司

出版发行 中国经济出版社

印刷者 北京市人民文学印刷厂

经销者 各地新华书店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31.5

字 数 480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3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 - 7 - 5017 - 9656 - 4/F · 8178

定 价 49.00 元

中国经济出版社 网址 www.economyph.com 社址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北街 3 号 邮编 100037

本版图书如存在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发行中心联系调换(联系电话: 010 - 68319116)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举报电话: 010 - 68359418 010 - 68319282)

国家版权局反盗版举报中心(举报电话: 12390)

服务热线: 010 - 68344225 88386794

推荐序

400年前,世界第一个股票交易所和第一个股份公司在荷兰诞生,并且可以说,荷兰正是因此而率先实现了市场经济模式和自由企业制度下的“大国崛起”。今天,在美国企业捐款只占社会全部慈善捐款总额5%的时候,荷兰企业的捐款已经达到了社会全部慈善捐款的50%。与此同时,荷兰公司董事会成员中有60%的人是绿色和平组织这类非政府组织的成员。

在这个动荡的时代,荷兰的“领先实践”是否会再一次成为一种全球性的潮流? 如果会,这是否意味着现代企业已经不再仅仅是一个商业组织,现代企业的领导人也已经不能继续把自己仅仅看做是一个商人? 姑且让我们假设不会,现代企业仍旧主要是一种商业组织,现代企业的领导人在本质上也仍旧是一种商人。但是,现代企业已经明显面临着越来越大的社会责任压力,现代企业的领导人如何在重重压力之下,带着社会责任的镣铐,继续把追求赢利和创造股东价值这一企业经营的经典之舞跳好?

来自荷兰的罗布·范图尔德教授,在其《动荡时代的企业责任:21世纪面临的挑战》一书中,试图给我们提供一套在目前这种企业与政府及社会之间边界混乱状态下,关于企业如何“把对的事情做对”的理论与案例兼备的“解决方案”。

公司治理,打开视野

在公司治理和企业社会责任陆续成为中国监管部门、学术界和企业界热门话题的时候,《动荡时代的企业责任:21世纪面临的挑战》一书又给我们提出了一个超越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社会整体界面管理。

公司治理的核心内容是沿着股东—董事会—经理层这样一个授权与责任链条展开的。扩展一下对公司治理的理解,则是把来自资本市场、产品市场、劳动市场上的各类要素投入者和企业经营的直接利益相关者纳入进来,构成所谓广义公司治理——合作关系管理或称利益相关者关系管理。罗布·范图尔德教授在《动荡时代的企业责任:21世纪面临的挑战》一书中,提出了一个思考公司治理与企业社会责任问题的更宽广的视角:企业如何在构成整个社会制度体系的国家、市场和公民社会这个三维空间里完成自己的职责。

即使是完善市场经济体系下的企业也不是在真空中运作的。企业除了要在市场面对投资者、消费者、员工及竞争者之外,还要面对国家(政府)和公民社会(非政府组织)。相应地,企业的行为也就不仅仅存在于一个清晰的市场边界之内,也还要或主动或被迫地介入到市场与国家及市场与公民社会之间这样两个交叉地带。全球气候变暖和金融及经济危机显示,现在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企业、政府和公民社会的共同努力。政府的作用不必多说,全球公民社会正在发挥着越来越大的影响力。非营利部门构成了世界第八大经济体。美国的营利性公司组织最发达,同时也有着范围最广的非营利部门,非营利部门作为公民社会可以计量的组成成份,提供了美国十分之一以上的工作。

在危机迫使政府更多地介入到市场领域,以及公民社会力量快速成长并以日益增强的姿态介入各种问题的背景下,企业管理者如何能够不陷于被动而是采取一种更为积极的方式参与到这场“社会改造运动”中来?罗布·范图尔德教授提出了一个“社会整体界面管理”的概念,来替代或是超越传统的企业社会责任概念。传统的企业社会责任概念强调的是统筹兼顾3P——人、利润和星球;社会整体界面管理关注的则是3E——效率、公平/伦理、效果。效率,把事情做对;伦理/公平,做对的事情;效果,把对的事情做对。

采用整体社会界面管理,面对最重要的社会问题,企业要思考自己是问题的一部分还是解决办法的一部分,要把自己从问题的一部分变为解决方法的一部分。使自己不成为社会问题的一部分,就要尽到基本的社会责任,相应地对社会问题采取的方法是不积极型、反应型和积极型;使自己成为解决方法的一部分,则要进一步采用一种主动/互动型的方法。

不积极型方法立足于弗里德曼的古典企业责任观,企业的唯一责任就

是创造利润,关注“把事情做对”。对于做什么,没有一种伦理方面的审视,可以是一切合法的生意。比不积极型方法稍微进一步的是基于社会回应理论的反应型方法,企业被迫服从利益相关者所定义的什么是适当行为的规范,当竞争对手做同样的事情的时候,经理人只“作出反应”。不积极型和反应型方法下,企业可能确实正在把事情做好,但他们的方向可能不对或者追求的目标是错误的——生产不好的产品或者是在干合法但缺德的事情。采取积极型企业社会责任方法的企业决意“做对的事情”,他们可能与非政府组织关系良好,但也存在忽视企业效率,并因此而危害企业生存与发展的风险。有效的企业社会责任实践是要以“主动并同时互动”的方式投入到社会问题的识别与解决之中的。为了把对的事情做对,要采用由哈贝马斯发展起来的“道德规范论述”概念——为了谈判和商谈大家都同意的一系列规范,各方定期聚在一起。

社会整体界面管理,把公司治理的视野从核心层面的股东主权和中间层面的利益相关者参与,扩展到了一个更广阔的外部环境范围,使企业与整个外部环境之间的投入—产出关系导向一个积极正向的循环促进之中。

社会责任,知易行难

社会整体界面管理的基本概念和逻辑,也许并非全新,同时也并不是很难理解,难的是如何去做到。

社会整体界面管理的基本思想在很多顶尖管理学家的著作中都有论述。战略管理大师迈克尔·波特把企业社会责任领域比做“有太多牧师的宗教”,但还是明确提出:追求完全赢利战略的企业只有在非营利问题(如环境)上也得到高分,才能获得“可持续的竞争优势”。提出了核心竞争能力理论的普拉哈拉德强调,为了企业社会责任问题持续得到公司高级管理层的重视,需要将其整合到企业的总体战略之中。汉迪指出:“新企业记分卡应该包括雇员的知识 and 福利等因素,以及对社会和环境的贡献。”明茨伯格提出:“企业是社会机构。如果他们不服务于社会,他们就没有存在的基础。认为他们通过赚钱和创造工作机会来服务于社会的观点是割裂的观点。”可以说,这些大师们关于管理问题的论述都很全面,但是越全面的方法,越是难以落到企业管理的实处。

首先,识别和判定什么是对社会负责的,以及什么是对社会不负责任

的行为就不那么容易。比如,伦理投资基金总是排除烟草和武器行业,认为他们是对社会不负责任的行业部门。但是,很难准确指出为什么他们就是不负责任的。武器贸易是法律上许可的,如果这能使和平守法的公民能够自卫的话,它甚至对社会是负责的。同样,烟草提供了快乐,有需求,并提供了税收,创造了贸易和就业,甚至还有福利。

其次,致力于社会责任的企业能够获得良好回报吗?如果没有良好的回报,企业能够持续经营下去吗?企业的持续经营,需要得到投资者和消费者的持续支持。致力于社会责任的企业能否得到投资者和消费者的更多支持,以使不会败于那些忽视社会责任的企业的竞争之下?这,取决于企业经营所处的环境,已经超出了企业所能“有效管理”的范围。在关于企业社会绩效和企业财务绩效之间关系的95项研究中,确认存在积极关系的占到53%。但是宽松资源理论提出,可以确认的企业社会绩效和企业财务绩效之间存在着的正相关关系,是因为财务绩效更高的企业有能力提供宽松资源,并将其投入到企业社会绩效中去。也有研究指出,在企业社会绩效方面得高分的企业,更多地受益于来自政府机构的支持。

就资本市场和投资者方面来说,有很多的社会责任投资者,他们不向那些他们认为是对社会不负责任的行业进行投资,这会使致力于社会责任的企业更容易得到资本支持。可是,同时也有所谓“邪恶基金”,专门选择那些被社会责任或伦理投资基金打上“不道德”或者“对社会不承担责任”标签的酒类、烟草、赌博和军火等行业进行投资,并且“邪恶基金”比一般指数基金收益更好。在产品市场方面,也有研究表明,爆出丑闻、受到消费者抵制企业,其销售可能很快受到影响,但是消费者的记忆时间似乎很短,过不了多久就又回复正常了。

最后,一个非常值得讨论的现象是,处在不同环境和地位的人,对于什么是好、什么是坏的看法可能截然不同,即使采用所谓“道德规范论述”、坐在一起谈判/商谈,也无法达成一致意见。所谓“沃尔玛效应”和“终止沃尔玛”的社会运动就是这方面一个很好的案例。沃尔玛坚持消费者利益至上战略,无情地追求效率,平均价格低于竞争对手14%;沃尔玛反对工会,努力保持员工低工资;沃尔玛在全球采购低成本商品。2002年,沃尔玛买入了价值12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占美国当年从中国进口总额的10%。沃尔玛加速了美国制造业的就业机会流向中国和其他低工资国家。这一切被概括为

所谓的“沃尔玛效应”，被《商业周刊》和很多美国人猛烈批评为一种“增长的恶性循环”——低价格、低工资、低生产力、低增长，甚至引发了一场“终止沃尔玛”的社会运动。可是从中国或者其他任何他从沃尔玛的全球采购中获得产品出口机会的国家来看，结论是相反的。

企业社会责任是一种有太多牧师的宗教，很多情况下可能是一种被误导了的美德。范图尔德教授对这种混乱的现象进行系统地梳理，也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太多的学者和企业家满足于对企业社会责任进行道德论述的良好感觉。范图尔德教授还进一步指出，“企业公民”的概念混淆了市场和公民社会这两个领域，只能看做是一种比喻。对于企业管理者来说，现实的做法是通过“社会整体界面管理”的方法，以一种主动并同时互动的态度，把伦理规则、社会责任承担等纳入到企业的战略目标和日常管理流程中去。

提升社会责任的公司治理

1973年，戴维斯提出了“责任铁律”的概念，认为“从长远来讲，那些没有按照社会认为负责任的方式来使用权力的各方将会失去权力”。

企业社会责任的伦理基础是慈善原则和管家原则。慈善原则指的是享受特权的人要保护那些未享受特权的人们的利益。管家原则指各利益方对经理人的信任，他们相信经理人能够考虑到受其商业决策影响的那些人的利益。从安然公司破产到全球金融危机，经理人的滥使用权力和“合法腐败”，已经迫使人们重新审视整个现代公司治理系统。

就公司这种组织来说，社会通过法律及心理契约给予其存在和发展的权力，但是如果这种权力被过度滥用，则会被收回。已经有一些比较激进的学者主张取消公司股东的有限责任制度。尽管目前还没有哪个主要国家认真地考虑这一提议，但是与激昂的企业社会责任呼声一样，这是一个挑战公司权力“合法性”的信号。削减公司权力和增加公司责任，是现代社会面对公司权力日益增长及其所带来的负面影响的两种不同回应。

安然崩溃之后美国出台的《萨班斯-奥克斯利法》选择了对企业高层经理人（而不是对股东）施加更大个人责任的做法，但是其他国家并没有跟进美国的做法，并由此引起了有关公司治理中经理责任的司法管辖权问题。爆发于美国的金融危机说明，到目前为止有关改进公司治理的各种努力，并没有见到明显成效。股权分散治理模式的一个关键基石——外部审计系统的可靠性令人质疑。

正如范图尔德教授指出的:谁来监督外部审计师?大企业和会计师事务所之间发展了“精英”联系。2003年,100家最大企业的53名财务总监都曾供职于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一些国家正在考虑实行强制性的审计师轮换制,有的甚至考虑将审计师的职能收归政府控制之下。这可能不会像废除股东有限责任那样对公司制度有颠覆性的影响,但也会严重削弱公司的自治权力。

现代世界大部分国家都赋予了企业相当大的独立性、信任和合法性,代表社会来运行市场制度。掌握权力的管理者们,有责任让企业以对社会负责任的方式经营。企业要对股东和公司的各类直接利益相关者负责,通过有效的内部治理机制,防止从控股股东、董事会到高层经理各个层面上的滥用受托人权力行为。与此同时,要对消费者和整个社会负责,要遵守公平竞争规则,消除通过垄断、合谋及腐败和假冒伪劣等方式破坏有效市场的行为。只有对消费者和整个社会负责,才能保证企业股东和直接利益相关者的长期利益。

与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及中国企业势力的迅速壮大相比,目前中国有关公司受托责任的立法与司法都还很落后,反垄断和公平竞争规则建设(治理商业贿赂及假冒伪劣)方面则更是落后,一些不顾社会责任的企业经营行为似乎“风险”不大。但是,“出来混总是要还的”,互联网的信息传递及迅速发展中的中国公民社会力量,正在发挥着越来越大的影响。不负责任的企业行为会越来越强烈地受到来自产品市场、资本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的惩罚。

构建一个能够提升社会责任的公司治理系统,使自身不要成为社会问题的一部分,并能进一步通过“社会整体界面管理”方法,以一种“主动并互动”的态度把自身变为社会问题解决方法的一部分,也许是每一个高瞻远瞩的企业都应该自觉作出的选择。

我相信,《动荡时代的企业责任:21世纪面临的挑战》这本书,会对每一个具有高瞻远瞩意识的中国企业及关注中国企业成长的相关人士都有所帮助。虽然我与本书的作者并不相识,但我们都为国家信息中心举办的“中-荷企业社会责任系列研讨班”做过讲座。本书译者刘雪涛女士已经关注公司治理和企业社会责任问题多年,并一直在参加相关的研讨项目,这是本书翻译质量的一个重要保证。

仲继银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2010年1月于北京

序 言

本书是 2006 年出版的《国际商业—社会管理》的升级版,内容更为详尽,其中包含了最新的发展。《国际商业—社会管理》由我和艾利克斯·范德兹瓦特合著(由英国罗德里奇出版社出版)。本书专门面向那些即便是在目前全球经济危机的困难时期,仍然对企业责任问题感兴趣的中國学生、学者、研究人员及企业管理人员。我深信这里需要的不是简单的解决办法,不是采取最佳实践案例,也不是描述“怎么做”的方法,而是要深入理解那些对不同的国家和企业来讲“什么是利害攸关”的问题,目的是为了达到具有最大可能性的可持续的解决办法。因此,目前这本书与 2006 年版的《国际商业—社会管理》建立在同样的原则和理念之上,并将这些原则和理念应用于 2005 年以来世界经济生活中所出现的一系列现象。本书最新的发展,包括中国企业和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日益凸显的重要作用,以及 2008 年 10 月所出现的金融/信用危机。对中国和中国企业所面临的“问题”的讨论,将有助于中国读者理解和适用治理模式、声誉/问题管理及企业责任问题。

本书之所以取名为《动荡时代的企业责任》,不仅仅是指目前全球性的金融危机,还因为现今的动荡时代。早在 20 世纪 90 年代全球化进程刚刚开始时就已经孕育了。这个时期,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很多经济体甘愿为了(有时候是自认为的)进步和国际一体化,而去承担巨大的风险。一些发生在当地的危机,当时可能会被描绘成事故,他们先是被全球性的生态和食品危机淹没了,最后被全球经济衰退的现实淹没了——对很多观察家而言,当时世界所面临问题的系统化本质的证据被忽略了。

这种并行的危机将会带来什么后果？世界需要多久才能从这种变革中走出来？这些都是无法作出预测的。但是，动荡的系统性和累积性的本质，无疑意味着相当长的时间内的不确定性都会很高。对企业而言，当然这里指的是那些跨国经营的企业，问题因此看起来似乎与如何处理现在和未来自益增长的风险和不确定性更相关。传统上关于监管还是放松监管的讨论，越来越被关于“相关性”，甚至是“智慧的”监管的讨论所代替，同时伴随着国际、国家和地方层面的制度建设。企业不是独立于社会进行经营的，对于企业的领导者而言，思考社会对他们的作用、责任以及适当（自我）监管的形式的“设计”，正变得越来越重要。如何与其他社会主体协作制定管理企业的战略？出于何种目的来管理企业战略？这些是涉及“可持续性”和“企业责任”的问题。

企业社会责任（经常简称为“CSR”）不是锦上添花或微不足道的活动，而是日益成为长期战略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即使是在当前，当大部分企业首选生存模式来渡过金融危机的时候，可持续商业也日益与可持续发展联系起来。无论如何，只着眼于财务底线，不仅是短视的，而且可能给企业带来灾难，因为问题的核心是社会的各个层面都缺乏可持续性和责任感：企业、政府还有公民。

讨论企业责任，应该包括社会和企业所面临的全部战略问题。幸运的是，企业责任已成为发达国家，还有发展中国家关注的主流问题。越来越多的观察家指出，只有真正的可持续战略，才能够为目前各种危机提供长期的解决办法，并指出这种动荡事实上为重新制定社会游戏规则创造了前提条件。我赞同他们的看法，但是我要强调的是，这既需要很多理想主义（思考未来），也需要现实主义（思考目前我们如何达成目标）。本书阐述了在探寻组织更具可持续性方式的过程中，企业与社会得失。为了分析企业在特定交易过程中所处的阶段，即面临的重大障碍等问题，本书增加了一章有关转型轨迹的内容。经济危机显示，现在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企业、政府和公民社会的共同努力。正如诺瑞娜·赫兹所总结的那样，她概括了所面临的挑战：古琦式资本主义（取自意大利著名奢侈品牌 GUCCI——“古琦”，这里指消费导向的资本主义）需要被合作式的资本主义所替代。为了填补始于20世纪90年代全球化浪潮带来的监管真空，需要建立新制度。《国际商业—社会管理》一书的网站（www.ib-sm.org），除了为那些感兴趣的读者

或愿意使用本书作为教学参考资料的老师,提供了很多实际应用及特定问题的“档案资料”,还增加了大量额外的案例。

本书的完成得益于很多人的帮助:我的助理、研究伙伴。在2006年的书中,我已经列出了一个长长的人员名单。在这里,我首先感谢全球报告倡议组织(特别是肖恩·吉尔伯特)邀请我于2008年12月在他们的中国培训项目中授课。将我的观点在中国环境下适用,这具有一定的挑战性。我认为这仅仅是学习轨迹的开始,我希望这是一个长期持久的任务。我也再次感谢国家信息中心组织了这次培训(传播西方发达国家企业社会责任的先进理论和实践),这次培训是由荷兰外交部资助的“中-荷企业社会责任项目”的组成部分,它使我有机会在大量的中国各地企业管理者中测试我的想法。因为有国家信息中心的鼎力支持,我能够在有关企业责任现状和预期方面,对中国的企业经理人和非政府组织代表进行现场调查。在此,感谢刘雪涛女士翻译本书,感谢曹蓁蓁女士翻译第14章~第16章的部分内容,感谢姜静女士翻译第16.4部分及校译和编辑本书的内容。当然,我个人对于本书的内容承担全部责任。

罗布·范图尔德
2010年1月于鹿特丹

目 录

CONTENTS

推荐序

序 言

1	第一部 动荡的时代
	PART I SOCIETIES IN TURMOIL
5	第 1 章 制度:呈三角形关系的社会 <i>Chapter 1 Institutions: Society as Triangular Relationship</i>
29	第 2 章 模式:社会内部和社会之间的相互作用 <i>Chapter 2 Models: Interactions Within and Between Societies</i>
54	第 3 章 讨价还价的国际社会 <i>Chapter 3 The International Bargaining Society</i>
71	第 4 章 社会界面管理的挑战 <i>Chapter 4 The Challenge of Societal Interface Management</i>
103	第二部 企业责任
	PART II CORPORATE RESPONSIBILITIES
109	第 5 章 逻辑:企业责任的多重概念 <i>Chapter 5 The Logic: The Multifaceted Notion of Corporate Responsibility</i>
140	第 6 章 时机:问题与问题管理 <i>Chapter 6 The Occasion: Issues and Issues Management</i>
161	第 7 章 利害攸关:企业是问题的一部分还是解决办法的一部分? <i>Chapter 7 The Stakes: Firms – Part of The Problem or Part of The Solution?</i>
202	第 8 章 机制:声誉和矫正 <i>Chapter 8 The Mechanism: Reputation and Correction</i>

- 232 第9章 背景:企业责任与企业国际责任制度
Chapter 9 The Context: CSR and ICR Regimes
- 266 第10章 转型过程
Chapter 10 The Transition Process
- 291 第11章 国际管理的挑战
Chapter 11 The International Management Challenges
- 317 **第三部 案例和结果**
PART III CASES AND CONSEQUENCES
- 321 第12章 供应链上的童工:西雅农家案例
Chapter 12 Child Labour in The Supply Chain: The C&A Case
- 328 第13章 生态问题:壳牌公司布伦特斯帕石油装载平台案例
Chapter 13 Ecology: The SHELL Brent Spar Case
- 340 第14章 健康问题:葛兰素史克公司案例
Chapter 14 Health: The GlaxoSmithKline Case
- 360 第15章 教训:声誉上的教训
Chapter 15 Lessons in Reputation
- 394 第16章 未来:走向主动的、战略性的利益相关者对话
Chapter 16 The Future: Towards A Pro-active and Strategic Stakeholder Dialogue
- 428 参考文献
Bibliography
- 465 附录 I 人名中英文对照表
- 473 附录 II 主要机构名称中英文对照表
- 后 记

第一部 动荡的时代

• PART I

SOCIETIES IN TURMOIL

柏林墙倒塌后的 20 年……

1989 年 11 月看起来是如此充满希望的一个新起点。随着柏林墙倒塌，曾经长久以来使世界窒息的 20 世纪最重大的意识形态冲突结束了：也就是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对抗、“自由”市场和“计划经济”的对抗结束了。哲学家们（福山，1992 年）宣告一段历史的终结；经济学家和经理人看到了巨大的市场以及不可胜数的机会展现在眼前，特别是对西方企业而言；政治学家则宣称这是作为社会决策模式的议会民主的胜利。90 年代中期，随着互联网的出现，经济全球化看似成了一个不可逆转的事实。当时迅速深入人心的概念是：我们已经居住在一个“地球村”了，距离将会消失，每个人都将生活得更加美好，整个人类都将从新技术和不断扩张的市场经济中获益。互联网带来了民主化的希望，也增强了对公民个体和消费者的影响力。很多经济体也许仍然需要进行变革，这是为经济的持续增长创造条件。全球范围进一步贸易自由化正在形成。很多国家开始制定一系列的私有化及降低国家干预的政策措施，并且开始以极大的热情加以推行。

然而，几乎就在 20 年后，这种构想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模糊了，对一些经济体来讲，狂热过后的不适感觉就更强烈了。一些曾经试图以最大热情拥抱资本主义，并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组织倡导的方法去做的、使用“休克疗法”的前计划经济国家，纷纷陷入了几乎是完全混乱的状态。他们的状况恶化得如此严重，以至于他们的人均寿命都降低了（世界银行，

2003年)。反全球化主义者的运动开始利用互联网反对过度全球化。事实证明,技术发展并非总是等于进步,它也带来了一些复杂的道德困境,如信息网络中的个人隐私,以及基因材料的可专利性问题。目前正在讨论的主题是:在信息时代,富裕国家和贫穷国家之间存在的日益扩大的“数字鸿沟”。无法达成具有约束力的国际协议来解决日益迫切需要解决的环境问题,如全球变暖问题;进一步的多边贸易与投资自由化的谈判进程已经停滞不前;国家正把自己拖进一个又一个金融危机。在1990年至2000年,联合国安理会从未像现在这样经常性地讨论战争的可能性,^①国家间的战争被国内内战代替了;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网络企业的网络一代看起来构成了这种浮夸氛围的一部分;股票市场暴跌,将很多小投资人拖入危机之中,没有人知道这种不稳定性将持续多久或者何时趋于下降。最后一点,但并不意味着它是最不重要的,“全球化时代”充斥着金融危机,没有国家能够幸免;从瑞典的银行危机,到美国的存贷款危机、墨西哥的比索危机、1997年的亚洲货币危机,最终到始于2008年的信贷危机,这对很多人来讲,预示着美国式资本主义的寿终正寝,还有金融市场国际监管的局限性。世界经济陷入衰退的局面不太可能迅速扭转。一个充满了自相矛盾的世界展现在人们的面前。这个世界深陷于相互联系的网络社会,以多重决策中心、巨大的治理差距为特色,因此它受制于国际讨价还价和谈判的规则,而不是法律。

新敌人

与此同时,作为这种正在出现的国际“讨价还价的社会”演变结果的一部分,资本主义已经树立了两个新敌人。首先,外部敌人,以国际恐怖主义的形式展示了自己。2001年9月11日,对纽约的世贸大厦和华盛顿五角大楼的攻击;2002年10月,在印尼巴厘岛发生的夜总会恐怖袭击;2004年3月,马德里恐怖袭击,都代表着全球恐怖主义在不断壮大的最直接、最血腥的和最新的证明。然而,在1995年前,问题就已经初现端倪,学术界就已经有警告“文明的冲突”的声音(亨廷顿,1993年)。用更符合管理方面的术语来讲,就是讨论“大世界与圣战”(巴伯,1995年)。其次,内部敌人,就是

^①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联合国安理会正式宣布对世界和平和安全威胁的战争有61次,而在过去的45年间,只发生了6次(西蒙斯和德·乔格,2001年第7页)。

那些谋得超高薪酬的高级管理人,以及不负责任的金融机构,他们代表了以这些形式出现并站住脚的内部敌人。这些商业领袖,不仅通过谈判为自己成功地获得了高额收入(奖金文化),而且为了使自己的股票价格保持人为的高位,他们设法将数十亿的费用,贴上资产或者收益增加的标签。他们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通过创造性的记账结构,并且常常是在外部财务人员的协助下完成的。在2002年6月13日,美国《商业周刊》杂志就已经谈及“内部的邪恶力量”正在威胁到资本主义。英国反全球化运动思想家诺瑞娜·赫兹谈到了“古琦式资本主义”的终结。

在美国,作为美国商业象征的施乐、世通、安然、通用汽车、默克和亚瑟·安达信等公司都先后倒掉了。甚至美国总统乔治·W·布什自己就是个商人,他也被指责进行内部交易。他试图通过采取更多的控制来平息不满情绪,但这最终让企业承担更多的道德责任,增加了企业的负担。事实证明,这些事件的发生并不仅仅局限于美国。在欧洲和亚洲,维旺迪环球、德国电信、莱尔努-奥斯比、帕玛拉特、艺珂、阿霍德、大宇、现代、住友和埃尔夫等,这些大企业也都纷纷垮掉。没有国家能够幸免于企业丑闻的窘境。在各个方面,商人被指责内部交易、欺诈或者获取过度收益。一些人最终被投入监狱,一些甚至自杀,这个结果让人回忆起“黑色星期一”及1929年那个重要的十月股市崩盘的巨大后果。在荷兰,最大工会的主席呼吁征收“窃国者”税。世界的政界领袖们谴责企业自肥的做法,但是政府一般却不增加税负或颁布更加严厉的法律。这其中的原因之一,可能就是一些政治领导人那时自己也被指责自肥。利益冲突的证据为公众所了解,会计师、咨询师和股票市场分析师的独立性受到质疑。经济体制和企业的诚信度在各个方面都受到沉重打击。从这个意义上讲,发生于2008/2009年的信贷危机,只不过是日益增长的对企业和国家领导人缺乏信任的基础之上,又增加了一条记录而已。

面临复杂境地

这些发展导致社会和企业面对日益增长的复杂性和迷雾般的难题(阿克夫,1999年)。大企业(在国际上运营的)本身日渐成为“社会”。企业越大,其与社会问题的纠缠就越多,抛开社会分析企业战略就越困难,抛开企业分析社会问题也是如此。社会和经济的巨大变迁,总是刺激企业对于最佳实践做法的渴望,最好能够有经济成功的单一灵丹妙药或基准。这种倾